

解密中国古代宫廷系列

黄朴民◎主编

对权力“放手”，往往能和富贵“牵手”；
和权力“牵手”，常常会与性命“分手”。

洞察历代功臣的生存潜规则

功臣悲欢

黄朴民 白杨◎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解密中国古代宫廷系列

黄朴民◎主编



功臣悲欢

黄朴民 白杨◎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臣悲欢/黄朴民,白杨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213-04124-2

I. 功… II. ①黄…②白… III. 大臣—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0800 号

书 名	功臣悲欢
作 者	黄朴民 白 杨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李 宁
装帧设计	顾 页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125
字 数	19.2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124-2
定 价	26.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引言

唐朝有句谚语：“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这句话精练地表达了功臣宿将在“收拾旧山河”、缔造太平局面中的作用以及不幸的命运归宿。

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善终的功臣可谓凤毛麟角，大多数的人走的是建功立业——横遭猜忌——举事谋反（或受谗去职）——身死名裂之路。皇帝在逐鹿中原、未登大宝之时，对他们恩宠有加，百般笼络，目的是让他们殊死搏杀，为自己火中取栗。然而，一旦尘埃落定、江山坐稳之后，主子们便翻脸不认人了。

功臣宿将没有死于敌人刀剑之下，却在主子的谈笑之间血溅刑场。不但如此，伴随着人头落地，还要枉担诸如“谋反叛逆”一类的罪名，使自己的冤魂在阴曹地府也不得安宁。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也是历史上大多数功臣宿将的人生归宿。“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功臣亡。”仅仅18个字，道出了古代功臣的悲惨命运，画出了一个无法走出的血腥“怪圈”。

纵观中国历史，屠戮功臣的事例数不胜数。战国时代群雄割据，诸侯林立，所以相对来说，功臣们尚有摆脱“兔死狗烹”结局的机会，至少可以找时机到其他诸侯国暂避风雨。

秦汉一统天下之后，功臣宿将的出路便每况愈下了。自刘邦开始，揭开了大规模屠杀功臣的序幕，并一发不可收拾。功臣宿将朝为座上宾，夕做阶下囚。



一条绵长不绝的历史长河里，汹涌流淌的是无数功臣宿将悲愤的眼泪，殷红的鲜血！

为什么会产生这类现象？蕴含在这种文化现象中间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杀戮功臣的影响表现在哪里？有没有走出“兔死狗烹”怪圈，出现君臣相安的可能性呢？这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探讨。

让我们透过这一文化现象的表层，一起去探索悬功臣宿将于生死一线的历史丛林吧。

引言

第一章

江湖风波恶,信知行路难——专制体制与功臣的生存环境

圈里圈外,戚继光的几多“郁闷”	3
祸从口出,高频的无妄之灾	12
贺若弼的口舌生祸	22
生死时速,尉迟敬德差一点玩大了	29
引火烧身,侯君集无后悔药可吃	39
左支右绌,一代名相寇准先生的无奈	46

第二章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功臣与天下兴亡

太公归周,撞响殷商王朝的丧钟	59
绝代双骄,扭转吴越新乾坤	70
英雄际会,大秦王朝崛起的谜底	88
天下无敌,给楚汉相争画上句号的韩信	101

第三章

“得陇望蜀”,还是“兔死狗烹”——功臣与君主的生死博弈

野心勃勃的王敦	117
宁愿遗臭的桓温	122

年羹尧为何在劫难逃	138
自毁长城：檀道济的千古浩叹	147
“亚父”伍子胥的尴尬	154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164

第四章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功臣与君主的相安之道

张良的旷达与明智	173
老虎扮猫，郭子仪的成功秘诀	181
光武帝刘秀的高明“柔道”	197
凌烟阁，唐太宗襟怀之写照	206
“杯酒释兵权”，不能不佩服的宋太祖	212

余论：有关功臣现象的文化反思





第一章

江湖风波恶，信知行路难 ——专制体制与功臣的生存环境

图里图外，戚继光的几多“郁闷”
祸从口出，高颀的无妄之灾
贺若弼的口舌生祸
生死时速，尉迟敬德差点玩大了
引火烧身，侯君集无后悔药可吃
左支右绌，一代名相寇准先生的无奈

君主和功臣就像一对磁石。遇到危难和外敌时，他们是正极、负极，紧紧地黏在一起，死活不分开。一旦大功告成，又是一副正正、负负的样子，势不两立：或者君主勃然翻脸，将功臣远远地排斥掉；或者功臣暗生野心，妄想取而代之，尝尝当皇帝的滋味。

只要当上了君主，就意味着拥有至高无上的役使他人的权力，伴随而来的还有无法想象的利益。对于君主来说，获取了这些，就要把有篡取能力的功臣尽快解决掉，可以安枕无忧；对于功臣、宿将来说，看着别人享受本是自己浴血换来的成果，那滋味自不待言。

功臣、宿将深知即使不反，早晚会被扣上叛乱的帽子，于是一咬牙，放手一搏。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他以此告诫世人要懂得“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凡事要有分寸，以免乐极生悲、追悔不及。但是，对大多数的功臣宿将来说，他们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还很难领悟老子这番话的真谛。事业与地位的变化让他们忘乎所以，由辉煌走向毁灭，功勋反而成了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圈里圈外，戚继光的几多“郁闷”

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字元敬，原号南塘，后改为孟诸，嘉靖七年（1528）十月生于山东济宁南的鲁桥镇，先祖皆为明代将领，六世祖戚继曾参与郭子兴领导的抗元起义军。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戚继仍在明军服役，在攻打云南一役中战死。明王朝追念其功，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检事。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治军严明，精通武艺，袭职之后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戚景通为官清廉，不对权贵阿谀奉承，家境十分清贫。后来，戚景通升任江南运粮把总，因不肯行贿而遭罢黜。

戚继光出生之际，戚景通已经 56 岁，老来得子，自然非常高兴。传说戚继光出生时，夜晚天空上繁星闪光，第二天清晨，朝霞映照着的鲁桥，与房前的红枫及苍松辉映浑然一体。戚景通便将自然界的美好景象与初生男孩的未来联想起来，起名“继光”，希望儿子成人之后能继承光大先祖业绩。



戚继光常年受父亲的熏陶及教诲,深深了解身为武人所必备的文武二道。他9岁时便以泥土碎石为垒,削竹子为旗杆,以纸旗为号,指挥颇有条理。12岁时,戚景通因居室颓圯,请工人修建一座四户两楹的新居。

按当时的规定,将门之家可装12扇雕花的门户。工人对戚继光说:“公子应向老爷请示装12扇门,以便让房子显壮观啊!”戚继光向父亲请示,没想到遭戚景通的斥责:“你怎能贪营华屋!你能立身守此,以奉祭祀,我就知足了!不然,即使现在是四户,将来也保不住啊。”戚继光大吃一惊,问道:“如何才能做到您说的立身呢?”景通答:“读书!读书在于认识忠孝廉洁。否则,读书也无用!”还有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马上遭来戚景通的一顿训斥,指责他小小年纪就如此奢华,长大之后还不变本加厉!将来成为将官,还不侵吞兵士粮饷!

戚继光的青少年时代并非在安逸中度过。10岁那年,母亲王氏去世,生活更加拮据。17岁时,父亲深染重病,命他入京袭官。临行前,父亲对他说:“咱家的家产变卖之后,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谨慎使用。”戚继光说:“儿子当求如何增益,怎么敢浪费父亲大人您的遗产。”到了秋天,戚景通去世,生活的担子由戚继光一肩扛起。

为了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娶妻,家计的负担稍稍减轻。戚继光袭了登州指挥检事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道出了戚继光的心声,也为他日后的事业埋下了一个伏笔。

二、“当今之虎臣,振古之名将”

有鉴于唐代藩镇的跋扈,明代开朝之初即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个世纪的更迭之后,文官集团进入成熟阶段,社会地位也达到了巅峰,武官的地位则跌入了历史的谷底。将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影响力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丽的文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备供给和军事制度方面难免受到影响。明初，任命军官多以“世袭”的形式子承父业，过了100多年之后，情况有了改变，有志成为军官者只需通过考试，及格便可取得晋升的机会。但是事实上，通过考试而成为高级将领的屈指可数。考试内容着重于刀枪弓马等技术的娴熟与否，完全忽略了军事战略的考查。因此，培养出来的将领皆为一介武夫，缺乏运筹帷幄的谋略，只得任用文官加以指挥。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等均由文官把持。这样的军事体制潜伏着危机，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暴露出明代军事制度的致命弱点。但是，军队情况仍没有得到改进，军事力量持续衰退。文官们认为，只要在他们的任期内天下太平，任何军事改革计划都是多此一举。

明朝规定，常备军由军户提供，每户出男丁一人，代代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维持兵员的充沛，二是保障民户不受征兵影响。此制度随之而来的流弊是：初期被纳入军户的民户多非出于自愿，或仅限于权宜之计。于是，各个驻兵的卫所里，士兵逃亡的情形屡见不鲜。到了承平时代（除了西北方之外），各卫所的不少土地被军户变卖，士兵的员额更是严重不足，有些士兵甚至被军官当成仆役或是运输劳工。

与军户制度一样，军队的补给制度也是问题颇多，盘根错节且账目不清，由于无法把补给点与补给线根据情势作一个全盘的规划，所以时常出现供应不足，起初的规定与现实状态格格不入，尽管有局部的修改，但仍无法避免捉襟见肘的窘境。另外，军队的装备也日益落后。明代不缺能工巧匠，但多数被征召至京城为皇帝的禁军制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部队只能穿衬以小铁甲的军服。至于武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格，由各地府、县制造，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以上种种问题，使明军的作战能力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军备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倭寇的侵扰对明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倭寇”不同于海盗，海盗多为乌合之众，烧杀掠夺之后随即呼啸而去；倭寇则不然，除了登陆建立根据地之外，还攻击城池。倭寇的祸害早在元末明初



便已初显端倪,至嘉靖年间最为猖獗。明代初期,国力强盛,朱元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等将领在山东至福建的沿海各地修筑城堡,严加防卫,因此未酿成大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封建诸侯为了争权夺利,彼此争战不已,在战争中产生的溃兵败将,也就是所谓的浪人便沦为海寇。还有部分日本商人,由于明朝对贸易加以限制,牟利无门,也沦为海盗。然而海盗并非全是日本人,中国人也不在少数,往往还担任高级头目。自宣德年间开始,边将及朝廷中的权贵、宦官大肆侵夺军卫屯田,士族不堪剥削,相继为盗,此外,明代禁止民间海运通商虽有明文规定,但往往无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到达的近陆岛屿就成了走私贸易的港口。在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贸易时纠纷的机制下,10多名有实力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为后盾,充当仲裁者,逐渐掌握了海上的话语权,成为海盗头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户为据点,自称“五峰大舶主”。当明王朝厉行海禁之时,沿海的一些商人豪富因利益遭受打击,便与流窜海上的海盗商人及倭寇互相勾结。



倭寇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明政府不得不采取较为强硬的策略,然而冲突一开,明王朝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虚弱即刻暴露无遗。一旦与敌交锋,明军将士往往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按嘉靖年间统计,浙江卫所,平均每卫1104人,仅是原数5000人的五分之一、福建约为二分之一左右,广东也约为五分之一上下。至于战船、哨艇,仅“十存一二”,军伍不振,战守无资,海防之废弛,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沿海军务,主司抗倭。朱纨上任之后首先攻下倭寇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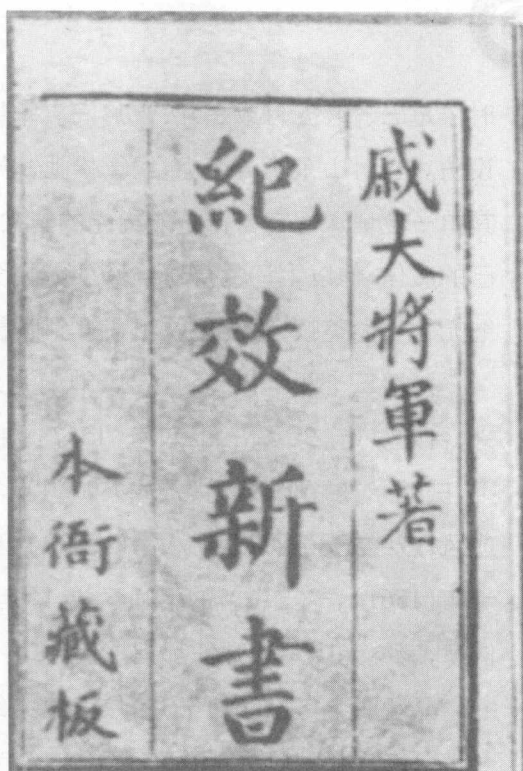
民族英雄戚继光,横刀立马走天下。

穴“双屿港”，擒杀通倭商人李光头，之后又在福建擒杀另一头目许栋，并设立了沿海防线。

朱纨在剿寇中处死了一批通倭的商民，引起在朝闽浙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朱纨断了他们通倭的财路。这些官员诬指朱纨处死通倭商民乃是“擅杀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纨人单势孤，大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朱纨惨遭罢黜治罪，冤恨难平服药自尽。朱纨死后，他一手建立的浙闽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被罢免。自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害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从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当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都率兵到这一带驻守，一连五年奔走在登州与蓟州之间。其间，戚继光曾参加会试，适逢鞑靼入侵密云、顺义、通州等地，京城大震，戚继光两次上书，献御敌方略。从此，朝中许多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倍加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信中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闾。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

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检事，主管山东的防倭军务。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倭寇的活动规律。当时的船舰以帆船为主，船只的航行及靠岸地点与风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倭寇活动最猖狂的



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精华——《纪效新书》。



时候是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间。掌握了这一规律之后，戚继光便按时按地设防。当时山东防务空虚，纪律松弛，老资格的军官大多轻视这位年轻的将领，其中一位资深军官自恃是戚继光的舅父，屡屡无视戚继光的号令。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他以上司的身份当众处分舅父，事后再以外甥的身份赔罪。经过戚继光的大力整顿，军队风貌迅速得到改善。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戚继光升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1557)，戚继光随俞大猷清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继光被解职，但仍“戴罪办贼”，次年攻下岑港，官复原职。鉴于明军腐败成风，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招募了一支部队，号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一支崭新的水师建成，同年，爆发了著名的台州战役，戚家军大败倭寇，戚继光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

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倭寇集结约万余人，大举侵略浙东沿海台州府一带，兵分两路进攻台州和宁海。戚继光闻讯立即亲率主力前往宁海，戚家军行军迅速。到达宁海时，正在烧杀掳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双方在龙山展开第一波决战，倭寇大败，余部流窜至雁门岭。雁门岭在温州以西，地势显要，易守难攻，戚家军经历一番激战，终于拿下了雁门岭。与此同时，台州县城也是岌岌可危，戚继光立即率领在温州的戚家军回身搭救台州县城。在战斗中倭寇故意将金银财宝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军捡拾，可是戚家军军纪严明，无人去捡。倭寇奸计未能得逞，戚家军一阵冲杀，倭寇溃不成军，戚继光部将陈大成、王如龙乘胜追击，一路追杀到瓜陵江，将倭寇全数歼灭。

嘉靖四十一年(1562)之后，戚继光连续在横屿、牛田、林墩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提升为副总兵，驻守温州、台州、福宁等处。由于连年征战，部队的补给出现问题，戚继光上书请求朝廷给予他“统一浙福之责”，并配以“节制调度之权”。在福建巡抚谭纶的协助下，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升任总兵，在仙游之役中，以寡击众，大败倭寇，福建境内的倭患，终于得以平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北方外患严重，明王朝决定将戚继光北调，防守长

城一线，这为他的戎马生涯开启了新的历程。

尽管任务更艰巨，他仍有雄心创立一番事业，可惜在守旧大臣的阻挠下，朝廷只授予他“神机营副将”一职。第二年，在执政大臣谭纶的保荐下，朝廷任命戚继光管辖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等地的军务，职权相当于总督。自戚继光镇守蓟州之后，经过10多年的边疆戍守，北方边境逐渐安定下来。戚继光守边有功，官升至太子太保、左都督，在援辽东一役之后，又加封太子少保。

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在书中，他指出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戚继光抗倭期间还改革了军制，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大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使部队的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调度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部队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三、生不逢时 时人惜之

戚继光辉煌的功业，与当时明朝的政治气氛相形之下，近乎是一个奇迹。如果光凭谭纶的支持，戚继光势必无法完成他所有的计划，幸运的是，他在朝廷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一代权臣张居正：让戚继光又恨又敬的人。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世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张居正在戚继光奉命北调前数月被拔擢为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史书中普遍被认为是雄才大略,一心改革的政治家。他给了谭纶和戚继光极大的支持。

戚继光到蓟州后不久,发现自己有其他将领没有的优势,即他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军备的整治,不必劳心政治上的斗争,因为所有跟政治有关的大事小事都有总督(谭纶)与大学士(张居正)的妥善安排。张居正本欲授予戚继光“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因群臣反对,又因这一官衔前所未有而搁置,但这足以说明张居正对戚继光的信任。授衔不成,张居正又寻找别的途径支持戚继光:他将原镇守蓟州的高级将领一一调离蓟州,以减少戚继光在蓟北重整军备时受到的牵制。

即便是在父亲去世、离职归乡葬父期间,张居正也没有中断对戚继光的支持。为了不让戚继光产生不安全感,他以私人信函告知了预定接替蓟辽总督的人选。该人选乃是梁梦龙,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仕途方面也多为张居正提拔,因此张居正在信中说“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戚继光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信任自是不胜感激,为了保证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之行的安全,戚继光派了一个连的鸟銃手做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这些举动表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寻常,也为戚继光悲凉的晚年埋下伏笔。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而是看他是否是“圈子里”的人。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倾轧不已。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许多功臣名将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前程尽毁,不得善终。戚继光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戚继光的晚年也陷入寂寞与凄凉中。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去世,平日遭张居正贬抑的朝臣群起反扑,纷纷攻击张居正,先前深受张居正支持的戚继